

油价暴跌对世界经济利大于弊

■马丁·沃尔夫
英国《金融时报》首席经济评论员

油价下跌对世界经济意味着什么?答案取决于油价为何下跌,以及下跌可能持续多久。但总的来说,它应该是有益的,尽管也有一些不利之处。特别重要的或许是它对石油净出口国的影响。容易受影响的石油生产国包括人们将会非常希望看到削弱的政权,尤其是弗拉基米尔·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。正如莫斯科盖达尔经济政策研究所的基里尔·罗格夫所指出的那样,油价下跌可能加快普京的复仇主义。

从6月末到本月初,原油价格下跌了38%。这个跌幅很大。但从1985年春季到1986年夏季,油价的跌幅更大。上世纪80年代初期到中期油价的剧烈下跌——并非巧合的是,这发生在苏联解体之前——是两件事造成的:上世纪70年代两场“石油危机”引起消费和生产的能源密集度下降,以及墨西哥和英国等非欧佩克(OPEC)国家石油产量大幅增加。

这次的故事没有太大不同,尤其是在供应方面。国际能源署(IEA)发布的最新《世界能源展望》显示,到2020年,非欧佩克国家的石油和天然气供应可能从2013年的5050万桶/日增至5610万桶/日。这将让非欧佩克石

油生产国在全球产量中的份额从58%提高至60%。预计这一增长中有64%来自北美。支撑北美产量增长的是美国的非常规石油(所谓的“致密油”)以及加拿大的油砂。与此同时,欧佩克国家的石油产量预计基本保持稳定。

非常规石油生产的革命性影响已经对石油产量产生了实质性的影响。美国石油产量在过去4年增长了400万桶/日。汇丰(HSBC)的数据显示,美国产量今年有望增长140万桶/日。利比亚的产量也在复苏。最后,欧元区、日本和中国经济的意外疲弱估计导致今年的全球需求下降50万桶/日。为了维持油价——非常规石油需要巨大的资本支出。而且,油价下跌、预期的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增长全都可能提升石油需求。此外,汇丰指出:“按历史标准衡量,全球闲置产能仍非常紧张,而且基本上集中于沙特阿拉伯。”虽然沙特阿拉伯已经说了不减产,但他们仍然有可能减产。

低油价将会持续,甚至会进一步下跌吗?我不会莽撞到预测油价的地步:石油的价格弹性非常低,而且供需差很小,因此很容易预测错。认为油价是暂时下跌的理由是,沙特阿拉伯将会很快实现打压非常规石油产量的愿望——非常规石油需要巨大的资本支出。而且,油价下跌、预期的经济复苏和新兴经济体持续快速增长全都可能提升石油需求。此外,汇丰指出:“按历史标准衡量,全球闲置产能仍非常紧张,而且基本上集中于沙特阿拉伯。”虽然沙特阿拉伯已经说了不减产,但他们仍然有可能减产。

在目前,我们是否正在见证油价长期结构性下跌似乎仍不明确。但让我们假设下跌会持续相当长时间。那么将会产生什么影响?本文列出6种影响。

第一,油价下跌40美元代表着生产者每年向消费者转移约1.3万亿美元(接近全球GDP的2%)。这是巨大的数字。总的来说,由于消费者快速支出的可能性也高于生产者,这应该对全球需求产生温和的推动。

第二,能源价格下跌将降低业已很低的总体通胀水平。这产生了两个彼此抵消的风险。一个是它可能加固超低通胀的预期。另一个相反的风险是,它可能鼓励央行忽视基本通胀率日益上升的威胁。总的来说,眼下前者的风险比后者要大。

第三,能源价格下跌将提升能源密集型企业的盈利能力。与此同时,它会削减石油生产商的利润和资本支出。它可能让能源领域(尤其是在杠杆较高的石油生产商当中)出现巨大的破产风险。它还将多大程度上影响信贷机构目前仍不清楚。

第四,油价下跌将把石油净出口国的收入再分配至石油净进口国。后者包括欧元区、日本、中国和印度。美国现在是石油净出口国。但重要的石油净出口国是那些严重依赖这些石油收入的国家。这些国家包括伊朗、俄罗斯和委内瑞拉。更优秀的投资不会发生这



种情况。但是当独裁者走投无路时也有风险。第五,能源价格下跌将导致资产价格发生变化。能源生产国的汇率将承受下行压力,俄罗斯卢布大幅贬值已经体现出这一点。无论直接还是间接受益于油价下跌的公司的股价都将上涨。这可能创造新的股市泡沫。

最后,油价下跌有可能让各经济体的碳密集度升高、能效下降。但它也为提高石油贴税,或者至少永久性削减浪费性的消费补贴

提供了机会。这是一个任何明智的政府都会抓住的机遇。不用说,这样的政府相当少。

低油价未来走势以及将持续多久依然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。但从其反映出供应强劲而非需求下降这个方面来说,低油价对世界经济提供了受欢迎的推动。低油价也代表收入从讨厌的石油专制政体向外作喜闻乐见的转移。很难不为此欢呼,即便降低补贴和增税的机会将会再次被抛弃。

倒逼的逻辑与空间:浙江模式再审视



■赵伟 浙江大学经济学院教授、博导

(上接12月7日04版)

第二个叠进,即产业组织的演进与嬗变。就是在产业发展过程中那些企业是怎么成长起来的?马克斯划分了三个阶段:第一个阶段是简单协作为基础的手工作坊;第二个阶段是分工为基础的手工作坊;第三个阶段是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工厂制度。到了工厂制度的阶段,这时候马克思领导了犹如一个乐队,需要指挥,需要指挥了。原来手工作坊不需要领导。布罗代尔认为可以分为两阶段:第一阶段是家庭作坊,家庭雇主,伙计干活的时候到雇主家里面吃饭,甚至住在雇主家里;第二阶段是近代工厂。我认为浙江可分为三个阶段:1980年代普遍是个体户和家庭作坊式企业,因为早期还在反资本主义,你搞得太大就是资本主义,但是你就放开他当时也搞不大。第二个阶段是1990年代应该是股份合作制,在温州、台州、义乌、萧山等地出现。2000年以后就看到一些集团企业,就像曾冠球的方向等,也就是2000年开始向国际发展的,这时候有集团向了。

第三个叠进,是企业家精神的形成与演化。企业家精神也分为三个阶段:第一个是个人商业才能。马歇尔在《经济学原理》里面提出,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域的落户跟经营商业的艺术有关系,他把经营商业当艺术做,做得有板有眼。第二个是布罗代尔提出的,工业家才能。商人和工业家不一样,知道一个东西以最好的价格买进来,以最好的价格卖出去,这是商人,别人看不到的商业机会他能看到。但是工业家是领导,他下面有车间主任,不是自己。然后他有组织能力,他能够把人组织起来,我们说生产函数里头求最优,把他做出来。给定产出投入最大化的,或者给定投入产出最大化的,他是做这个函数的。最后是企业家精神。熊彼特强调创造性,企业家是天生的创新者。后来企业家精神里面加的越来越多,有社会责任,道德等。相应的我把浙江分三个阶段:1980年代应该是商人的个人商业才能发挥作用的阶段。那时候主要靠个人,所谓的“能人”经济。1990年代有了工业家才能,90年代曾冠球基本上是一个工业家,他有一个厂,下面有“中层干部”,然后按照比较最优的方式把产品生产出来,但是卖给谁呢?有专门的机构

帮他卖,不用跑市场。但是2000年以后就不一样了,他得考虑研发和创新,以及整个市场的开拓和国际化。企业家精神的演化在浙江经历了这三个阶段。

我认为这样三个阶段是有联系的,每个阶段彼此横向联系、纵向演化。产业集聚空间的叠进,先是产业地方化,在温州,在义乌,在宁波,在萧山这些地方落地生根。当然后来有政府插手搞开发区。然后产业集聚。产业落地生根以后,利用空间外部性,产生滚雪球效应,义乌的浪莎袜业附近有好多生产袜子的企业。这就是产业集聚。我们说你要开饭馆,最好在成功的饭馆旁边开,制鞋就在成功的鞋厂旁边开。为什么?这样就好吃原来那个成功的鞋厂的工人,并且供货商也会找你,因为上游产品,我这一条街上,这一个镇都是造袜子的,织袜设备厂的人就来找你,你就是买方市场,然后跟他讨价还价,可以有最好的价格。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就开始扩散,像后来各个县之间,各个地区之间争企业,招商引资,给你更好的产业,产业开始扩散。产业组织叠进是这样三个阶段。在这同时,从个人商业才能到企业家精神三个阶段,彼此都是有联系的。

现在看产业发展与制度演化。制度是怎么变的?这里有几个倒逼机制。在中国看空间,看地区,得有一个多层次区域分层的空间意识。中国的地区是立体的,西方国家地区是平面的,虽然美国的总统跟州长算是两个行政层级,但是总统管不了州长。因为州长是民选的,州里也有宪法,只有宪法可以制约他,行政是没有办法插手的。同样因为县长也是民选的,所以州长没有办法把县长免掉。因此它的体制看起来似乎有科层,但是实际上是平面的。我们的体制是行政的层层科层,可以分出五个层次,但是这些层次里面,行政真正对产业区分布产生实质影响的,是省和县。

说到第四个叠进,即产业空间的叠进。浙江改革开放头三十年的产业发展过程,大体上可分出三个时代:第一个时代是“乡镇经济时代”。80年代民营企业大部分是乡村企业,村里办的,有些就在自己家办,它逃不出乡镇的范围,所以叫乡镇企业。第二个时代是县域经济时代。90年代的时候有些企业长大了,有些老板在城里买了商品房,把家属搬到那里,首先要解决孩子上学的问题,然后开始进城了。正好政府开始搞开发区,县域经济时代降临,产业向县城和开发

区集中。第三个时代可称作区域经济竞争时代。2000年以后露头。那以后各个地区开始抢产业,这时候一个老板不一定在这个县了,温州老板不一定在温州了,跑到外地去了。萧山的老板也不一定在萧山,跑到外地去了,这是一个扩散过程。

现在看第五个叠进。在上述产业空间叠进过程中,就有一个区域制度转型进程与倒逼的承受主体变化的过程。80年代乡镇经济时代,制度倒逼的压力在县市那里。我1999年发的文章《温州力量》,就受到好些个质疑。尤其是江苏有几篇质疑的文章。最后争论的结果,似乎是我们这一方胜了。1999年那次是围绕温州模式的最后一次争论。县域经济时代是县级政府和地级政府要承担责任,面对底下的制度创新你要表态。所以是这样层层倒逼。到了区域竞争时代,省级政府着急了。2000年以后,加入WTO以后,外省很多地方都派人,这时候来引资,希望浙江商人到那去投资,到那来政府坐不住了,你跑掉了,我们GDP保不住了。得改善投资环境。最近两年还在做这个事情,叫做“浙商回归”。地方领导带团去外地把当地浙商请回来在浙江投资。这样就是地方竞争,要让步更大,以更优惠的政策,更灵活的体制来吸引他们。这就是诱致性制度变迁,因为发展经济,老百姓得到好处,地方政府财政收入增加,皆大欢喜。所以倒逼政府默认制度上的灵活做法。

再看产业区域范围叠进与制度倒逼的关系。乡镇经济时代是1980年代,县域经济时代是1990年代,区域竞争时代是2000年以后。改革方面倒逼压力的承受者,最初是乡镇政府,村里偷偷摸摸摸的时候是乡镇政府承担政治风险,后来是县市政府,再后来是省级政府。大概到加入WTO一两年以后,你可以看到,浙江省政府有的权限基本上都使用了,因为制造业这块搞非国有经济,它基本上全部允许了。小的服务业,开饭馆、商店、旅游之类,这些全部都私有了。但到了超出地方政府权限的领域,便无能为力了。尤其是金融、主体运输业(铁路)等。农地制度也是一样,地方政府没有权改了。几任浙江委书记都找我座谈过,我十几年前就喊,我说浙江要改两个,一个就是农地制度,一个是金融体制,如果这两块不改,温州一定会被边缘化。省领导听了只是笑笑,因为地方被没权。

上述五个叠进我画了一张综合图,为什么要将这些叠进画在一张图上呢?我认为它们彼此是关联的,是一个机理系统,缺一不可。

左边是创新的动力基础,从左到右描述五个叠进,从下而上描述三个阶段。比如企业家精神的演化三个阶段,第一阶段是个人商业才能,第二阶段实际上主要还是个人商业才能,我们前面讲的工业家才能这里面可能有一些。第三阶段是企业家才能。这两块(产业组织和产业集聚)是彼此连在一起的:个体企业和产业地方化时代是联系起来的,特定产业在特定地域安家落户,即80年代的个体企业在特定地域形成地方化。到90年代产业集聚就有股份企业,企业做大了,有了集聚经济,借助集聚外部性,可以把企业做大。然后到2000年以后,产业开始转移了,也就是扩散的时候,就是集团企业,集团企业才有力量扩散。然后我们看第四个叠进,即产业集聚区的空间叠进,从乡镇经济时代,而县域竞争时代,再到区域竞争时代。然后制度叠进的压力对象在哪呢?80年代是基层政府、乡镇政府,县里是默许的。

90年代是县市政府,省里面是默许的。到最后是省级政府,省级政府是把能放的全放开了,能允许做的全允许了,因为要跟外地竞争,所以转型就是这样的,1992年之前是改革,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国向哪里去,改革的目标模式都没有找到,以后才确定市场经济,然后我们看2000年之后整个是这样。所以我们看个人商业才能、产业集聚、诱致性制度变迁等叠进的关联,这个是成立的。然后产业集聚叠进,区域竞争,至下而上,是这样过来的。

五个叠进,我们看到一度的困顿,迄今没有太大的突破。我说五个叠进,四个受阻,一个走偏了。前几年《第一财经日报》约我写了篇稿子,他们改了一下,题目叫做《浙江经济奇迹遭遇四个瓶颈》,我当时提出来是五个方面有问题。

第一个是产业集聚遭遇三产主体行业垄断。现在产业的金融、主体服务业,这一块到现在没有实质性的改革,还有通讯业,中国现在信息通讯业让几家央企垄断,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。我们作为消费者直接感受到,到外国打国际长途好像不要钱似的,随便打;到了中国跨省打电话都很贵。全世界数字产品都在降价,我们的数字电视还成天在涨价,而且没有降价的IP。我去到日本,人家宾馆大堂里面就有看电视,你随便打,不要钱,而且专门是打国际长途的,在中国肯定没有这个事。所以产业集聚遭遇三产主体行业垄断,所以浙江产业升级,你现在做的就是低端制造,阿里巴巴是在新兴服务业,电子商务是新兴服务业,传统的行业根本没有进去。

第二个受阻表现在产业组织的演化上,企业长不大与家族化“陷阱”。现在你看老的那些企业长不大,而且到现在的浙商,列出来的那些有名的基本上都是家族化的企业。还是靠血缘关系,亲情关系在维持,外人插不进去。我有个博士生,读了一半没读出来走了,他原来是加拿大籍的,在雷诺公司做过,到浙江一个大企业做海外总监,做了两三年不做了。说这个企业看起来很好,但是进去以后很多问题没有办法处理,说了不算,算了不说,在国外做了很多年,在这里很不适应。具体是哪个企业我不讲了。

第三个受阻表现在产业区扩张方面,遭遇“国进民退”。浙江商人这些年到山西炒煤,最早是到陕北弄油,最后那个地方中石油看上了,以前油价便宜的时候私人做,后来油价涨了以后中石油要搞,最后给陕西地方政府弄走了,浙江很多商人是颗粒无收。后来山西炒煤,很多浙江老板都亏了,有些真是血本无还,几十年辛苦攒的几百万,借了亲戚的几千万,都亏了。然后到贵州炒矿也是亏得一塌糊涂。上一次光伏产业,温州很多企业搞光伏,也是招致巨亏。其中温州跑路跑得最有声色的“眼镜大王”,把几个亿投进去搞光伏,几乎全亏了。后来我写文章调侃说,他可能把“两”字搞错了,他搞的是光伏,光伏是“两”字,一个“光”字,我相信在很多浙商里面是个伤心字,不是光彩的光,而是输净光的光。

第四个是制度倒逼,遭遇超地方政府机构狙击。其中金融和农地制度是死结。几任浙江领导座谈我都讲过这个事,有一任领导明确讲没权。但是怎么改?金融改革看样子现在在下决心要改了,但是按照现在这个做法,我看不到突破。农地制度改革,按照现在的确权做法可以解决一部分问题,但是最后做出的是什么样的制度?还得看看。一个走偏的,是企业家精神。企业家政

商化和浮躁化,都想参政议政,当政协委员、人大代表等等。然后是浮躁,做到一定程度,就想赚钱快钱。还有贴近“官意”走。我们现在在国外搞很多援建,一些民企跟着“走出去”,不少浙商也是跟着这个走出去,给忽悠到非洲、前苏联的乌克兰等地,投资的政治风险很大。

上述几方面叠进,最近七八年没有什么进展,早期浙江那种势不可当的线型的演进停顿了,所以出现了后面的困局。

“后危机”以来是不是在形成一种新的倒逼机制?我开始讲“新倒逼”现象,小区域跟大企业,两块的动作有些遥相呼应的意境。

先看小区域。最有声色的就是2010年到2011年的老板跑路潮。所以我管那之后的浙江叫做“后跑路时代”。现在各级政府都担心老板跑了,因为一个老板跑了,一串人都要负责。我说中国现在叫“后刺激”时代,现在政府要再刺激,得慎之又慎。上一轮刺激过头了,北京甚至大半个中国的雾霾就是最明确的警示。温州经历了老板跑路,似乎还是起了一些作用的。金融改革试水,不管怎么说,还是倒逼出来了一些政策;紧接着的义乌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,显然也搭了这个顺风车。舟山现在在横仿上海搞自贸区,搞海洋经济。这方面问题不少,有些地区借着搞海洋经济把海岸线全破坏了,填海太多。你到温州乐清去看看,15年前去乐清,城市离海边很近的,现在去海边很远了。滩涂全给填了。填海太可惜了,真是短视。这是浙江地区层面做的事。

再看大企业,它通过国际化倒逼体制,吉利收购沃尔沃,通过“走出去”,然后再引进来,打入了一个国有跟外资分割垄断的主体行业造车。现在造车不能不考虑吉利沃尔沃的影响,它的声势很大。然后我们说阿里巴巴,我前面讲过,它正倒逼资本市场改革。还可以举出一些例子。所以,我们不可以把上述现象看作是一种新的倒逼机制?

这个倒逼机制是什么呢?在空间上看是自外而内。前面划分的制度倒逼三个阶段,仅仅限于一个省的范围,充其量包括中国范围内区域间竞争,现在是国际化的,借助国外的资源和背景来倒逼。比如说老板跑路,以前多少老板能跑国外去?现在能跑的人多了,富人有能力跑。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富人的移民,投资者把资产倒腾到国外。还有“李嘉诚现象”,把中国房子卖了到英国投资。李嘉诚很有企业家眼光的,在英国真是抄底了,在中国的房地产又卖了个好价钱。如果这个形成一个股浪潮就很危险。我们按照国际经济来看,一个地区产业集聚到一定程度,由于各种因素会出现拐点,它会扩散到别的地方去的。所以我们现在面临这样的风险,在互联网时代,信息和资本能以光的速度在全世界流动,资本外流更容易。而且中国“90后”一代做国际化是很容易的。大学里面很多高材生都想出去,也有这样的人力资源储备了,所以这是一个风险。所以形成一种新倒逼机制,走出去、跑出去倒逼改革。

第二个是微观主体,是民营企业、地方政府的默契。温州民企跑路以后,高层领导来了,地方政府也没有人承担责任,跑路后没有任何一个政府官员承担责任。似乎地方政府跟企业有默契的,是不是一种“新倒逼机制”?这种倒逼机制能不能跟我前面理出的这个演进的阶段放在一起?这是我正在思考的问题,答案尚未得出。(完)